

新人文理想的重建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守成倾向研究



张旭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人文理想的重建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守成倾向研究

张旭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人文理想的重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守成倾向研究 / 张旭东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308-17770-2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6250号

新人文理想的重建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守成倾向研究

张旭东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蒋红群 张小苹

封面设计 周 灵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52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70-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与‘主流文学’的重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邵燕君,批准号:14BZW150。

序

记得早年在阅读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时,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越是现代社会,则越会出现反现代化的思潮,产生文化守成主义(又称文化保守主义)?读艾恺的著作,似乎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但又似乎没能完全弄懂其中的根本道理。在艾恺看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化追求,尽管为人类开启了一个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新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一种思潮,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典意义的悲剧,因为它的进展总是以不断毁灭对人类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让人失去对历史、传统的记忆。在滚滚的现代化浪潮面前,人们一方面兴奋不已,毕竟现代化极大地满足了人的世俗欲望;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内心深处却又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尤其是那些逝去的文明,总是让人感到深深的忧伤。艾恺从辩证的角度,特别是从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角度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中发现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一体两面及其紧张关系,同时又从思想史维度对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进行了实证性的批判与分析。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启蒙与启蒙的批判,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批判,两种思潮相互交织,相生相伴,其冲突也会持续下去。在艾恺看来,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归根结底还在于人性。他说:“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者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近两百年来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各种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显然,在他的眼中,守成主义的本质乃是人性深处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

当然,从人性的角度来探究文化守成主义的根源,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探究方式,毕竟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非白即黑,非善即恶。人性是一条悠长的河,弯弯曲曲不仅仅只是因单纯的地理环境所致,同时也更是河水因势而变的规律所致。但是,真正的问题则是:要从人性的根源上去探究文化守成主义生成的内因。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取人性的证明,特别是人性复杂性的证明?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艾恺在他的著作里,尽可能地结合历史发展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一事实来做全面的探究,但似乎也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讲到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着重讲了现代文化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守成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文化上的守成主义(保守主义)并非是落后、退步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激进主义相对应的思潮,也就是说文化守成主义(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是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与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和渐进式的变革,主旨是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尽可能地避免过度猛烈的震荡,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历史的持续进步,如同刘军宁所说,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和原则是:谋求超越性的道德秩序建构,坚持社会发展连续性的原则,主张审慎的原则和倡导多样性的原则等,以实现从不断量变而达到质变。因此,以文化守成主义的理念来看待现代文学的生成,就不难发现,晚清以降,在鼓吹“学习西方”而不断地倡导“欲新”(如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必欲新一国之小说”)之说中,一股谋求激进变革的思潮占据了文化界和文学界,而在这当中,与之相对应的守成主义思潮也在不断地聚集力量,与激进主义文学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说民国之初的林纾与蔡元培就新文学发生的不同意见,就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学衡派”的文学主张而言,以往都将其归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落后、保守、反动的文学思潮,几乎是一棍子将其打死,全盘否定它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文学现代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实,就文化理念而言,恰恰就是这群被称为文化守成主义者,为五四激进的文化、文学主张提供了一面难得的参照系。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并非清朝的遗老遗少,目光短浅、抱残守阙、故步自封,而是留学海外,谙熟中西文化,对传统与现代都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之人,他们为中国文化、文学如何现代化提出了

诸多的真知灼见。斥责他们是落后、反动的势力,是完全不对的,也是不公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看到了历史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破坏,尤其是对支撑一个民族精神系统和价值与意义世界的文化传统的破坏,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主张以固化民族文化本位的原则来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1935年1月,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共同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也是沿着这种理路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守成主义价值取向。他们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方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他们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注重每一民族、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与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权利自主地选择接受,或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激励国家与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无疑,从该《宣言》来看,其文化守成主义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其特点并非以往被指责为反动、落后、保守的势力代表,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文化策略,一种新的人文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文化守成主义从中心走向了边缘,不占据时代的主流位置,但在新时期重启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浪潮,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则又开始悄悄地复兴。仅以文学为例,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个创作高潮之后,从“寻根文学”开始,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倾向最先得以表现,阿城的“三王”(《树王》《棋王》《孩子王》)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张炜的小说、张承志的小说等等,都传达了文化守成主义的思想情感,表现了文学对重启的现代化进程走向的一种深沉的忧思。我在上课时对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与文学关系的梳理,给研究生们大致地勾勒了其演化和发展的轮廓,主要的目的还是给他们打造一个学术研究平台,让他们能够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作一些学术性的奠基。

旭东是2008年入校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十分勤奋,每次上课都是带着自己的思考和问题来的。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的确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还涉及学术训练素养和学术研究的功底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中国现当

代文学学科所涉及的内容真正的只有100年,与古代文学来说,在时间上是极其不对称的,而且在今后的文学史中,百年历史不过是一个章节而已,况且该学科的研究者如此之多,要真正选好一个题目来做博士学位论文,还真是要花一番功夫。听了我的课之后,旭东与我商量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他说他对文化守成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选题比较感兴趣,并向我陈述了他的理由,我听了他的研究设想,觉得他对这一选题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我很高兴,同时也是因为前一届的博士研究生已经选了自由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题目,按照我的设想,自然是希望旭东这一届来做文化守成主义与现当代文学的题目,这样也好形成一个研究序列,形成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特点。

旭东是一个有毅力、有韧劲、有理念的人,一旦认定目标,他就会排除万难而坚定、执着地大步朝前走。他的这个特点,我非常欣赏,对他的选题和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其学位论文的写作,我是很有信心的,也为他尽力提供帮助。在开题中,研究所的各位老师对他的这个选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一一整理、归纳,并加以吸收,一稿出来后,我看了他的论证,总体符合开题的论述设计,逻辑性强,文本分析细腻,行文流畅,在经过二稿、三稿的修订之后,定稿提交外审,双向匿名进行评审。反馈的评审意见很好,专家们都对他的选题、分析、阐释和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答辩时,他也很好地回答了评委的提问,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他的学位论文。

毕业后,旭东回到了他原先工作的单位,在执教的同时,继续他的这一选题的研究,并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研究”为题,申报了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获得了立项批准。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他继续沿着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对当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与当代小说创作所作的全面、系统、深入思考的结晶。我认为,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具有充分的逻辑说服力,如同他在书中所宣称的那样,他的这种深化研究是为了分析、探讨和解释这一问题,他的“做法是,以‘新人文理想的重建’为核心立论基点,力图探讨和研究,面对中西文化的双重困境和危机,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何因传统生命理想的失落而产生文化守成倾

向？其必然性和历史、时代的背景如何？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有着怎样的主题指向和价值追求？其在艺术营构方面的突出特点怎样？其时代的价值意义以及局限和偏颇各有哪些？……一系列问题”。应该说，他的这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书稿即将付梓之前，旭东来信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接受，于是写下以上一些感想，一是向他的新书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二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再对这一选题进行更为开阔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系统的研究，形成自己对这一选题研究的系列成果，为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黄 健

二〇一七年初夏于西子湖畔

目 录

绪论 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第一章 新时期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重新勃兴

018 | 第一节 社会现实语境

029 | 第二节 重兴的实质与表现

第二章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

035 |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保守主义人文主义话语

043 | 第二节 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的主题内涵

第三章 “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文学呈现

053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葛

061 | 第二节 寻根小说的文化守成精神

077 | 第三节 历史文化小说的传统守望

第四章 现代性反思的审美表达

087 | 第一节 城市工业文明的批判

098 | 第二节 启蒙现代性的反思

117 | 第三节 乡土文明的礼赞

129 | 第四节 “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的重建

第五章 生态和谐的呼唤与追索

148 | 第一节 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主义思想的兴起

156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161 | 第三节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生态书写

第六章 文化守成小说的艺术魅力

173 | 第一节 古典性的审美胜境

187 | 第二节 浪漫性的诗学理想

201 | 第三节 民间性的风格追求

第七章 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的辨证省思

217 | 第一节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失衡

227 | 第二节 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误区

240 | 第三节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

247 | 后记

250 | 参考文献

261 | 索引

绪 论

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最深刻的一次转型,是从古代(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关于何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如何,许多睿智的思想家作过申说,而且,他们往往把它和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现代性”进行对举,认为“现代性”正是“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结果,而“现代化”是为了达到“现代性”的效果而进行的一种动态过程,“现代化”更多指向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现代性”则更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把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概括为资本的产生和扩张,以及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就是理性化,它表现为科技化、法制化、货币化、世俗化以及科层化等不同形态;齐美尔则认为,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物质文化侵袭个体独创文化;解构主义大师利奥塔却主张,现代性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及其历史哲学……总之,“现代性拥有极其庞杂的内涵。从世俗化、理性、自由经济到线性的时间观念、厚今薄古、民族国家以及复数的现代性,西方众多思想家的理论表述迄今仍然有增无减”^①。有了西方这些思想供借鉴,中国学者在论述“现代性”的内涵时就往往采取综合概括的方式,如包亚明认为,“不管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如何纷繁复杂,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普遍同意:现代性的开始引来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而这一形式又在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中得以呈现。现代性本质上是动态的,使人们能够控制自然,能积极地改变社会生活,能通过

^①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民主政治和平地管理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现象上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危险”^①。陈晓明则指出,对“现代性”应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②

其实,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都是相对于传统或传统性来说的,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变。这一深刻转变从西方开始,然后逐渐波及全球,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趋势。相对于西方对“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进行的,是一种“外源后发型”的现代追寻之路,这也注定了其更加步履维艰的命运。有学者通过比较中西两种现代化进程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原生形态,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过程,因而一般采用渐进的演变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晚近亚非拉美等国家的现代化则大都属于诱发型,是在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时间短而集中,所以往往采取突变的即革命的方式。^③也正因此,虽然在中国现代史上,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一样,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行回应的产物,也是诞生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以“实现现代化”为理想目标,但在整个激进革命思潮占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其被排斥、被抨击的历史命运不可避免,这一情况直到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稍有改观。

①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3页。

②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5页。

③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代序第1页。

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一般说到“保守主义”，是从社会政治领域来进行界定的，指的是一种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态度，其突出特征是守护秩序，主张稳妥、渐进、改良，反对“激进”的革命行为。而“文化守成主义”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区别也很明显：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更多的是指一种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它要“保守”的更多是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在对待民族文化的传统方面却持审慎态度。

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文化守成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最早出现于西方世界的，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德国的哈曼、谢林、费希特，英国的柏克、科贝特、柯尔律治，法国的梅斯特、托克维尔等。艾恺认为，虽然这些学者在出身、经历、学识、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多有不同，思想见解也多有抵触，但总体来说，“都以各种传统形式（或理想化）的社会当作社会完善的试金石”，并都对物质私利“有深刻的厌恶”，“唯恐它会毁坏所有建基于道德原则的所有的人群关系。他们对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心存疑惧，就是彻底仇视，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及其病态与非人性化。他们强调社会重于个人，有机的群体关系高于法律关系及法定权利……渴望共有的道德价值和真理的共同认识与分享……高度评价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非功利方面——艺术、宗教等等”。而且，他们“虽然不否定理性”，“却常亟思建立一种认识论，为道德价值建立一个基础”。^①从艾恺的这种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置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申说的，认为文化守成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出现的，是对启蒙运动主流的辨证的反动，是一种“反现代性（化）”的思想潮流，“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

①[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77页。

文化与道德价值所做的意识性防卫”^①，其主旨可概括为：以价值理性来为工具理性纠偏。

这种思潮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知道，启蒙现代性的成果最突出表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人们曾天真而乐观地认为，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充分发展，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进步，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科学及其技术手段成了现代世俗宗教，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米修斯般的能量，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并取消所有的自然限制”^②。但社会发展的结果证明，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进步虽然带给人类很多便利，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日渐加强，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为人类带来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诚如艾恺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③。进入工业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世界变得陌生而复杂，人被机器统治和操纵，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而疏离，人与自然也前所未有地对立和疏远，“这种个人和社会的疏离感、陌生化，个体所感到的孤独感和无所依靠的心境构成了工业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④。德国学者冈特·绍伊博尔德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一书中曾扼要地将新时代的技术特征概括为八点：1. 物质化。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现代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材料，从而也失去了它自己的价值和真实性。2. 齐一化。最不同的存在领域被千篇一律化，事物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被否决了。3. 功能化。新时代功能化的突出方式是自然被功能化为能量的提供者，而不是与人共处的存在。4. 主客体的两极化。5. 对一切存在着者的谋算。6. 贯彻和统治。不再顾及事物的独立性和自身性，而已命令式的意志对待事物。7. 生产和

①[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②[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③[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④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加工。8. 耗尽和替代。^①在这种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独大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种种“病症”也开始频频出现: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物欲膨胀、消费主义盛行与终极审美理想失落……面对诸种问题,西方许多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都开始对这种单一的“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如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韦伯、马尔库塞、阿道尔诺以及霍克海默,等等。

总的来看,源自西方的这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其宗旨是为了拯救因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畸形症状,它强调向后回顾,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社会有许多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吸取、学习的资源。就像有论者所论述的,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地、粗暴地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而且,它趋向的是“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②

西方这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它的“保守”已完全不具有汉语语境里极富贬斥色彩的“顽固守旧”“反对变革与革新”等意义,所以,美国学者艾恺在其著作中没有用“保守”这一词汇,而是从孙中山的名训“守成不易,创业维艰”中拈出“守成”二字以与“保守”相区别,强调文化守成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客观地说,文化守成理论也是一种极富“现代性”的理论,它一方面认可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技术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对文化激进主义、科学主义、经济主义带来的文化失范、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的变异与沦丧等问题忧心忡忡,力图从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规范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救治与制衡。这些都为反思现代化、约束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资源。

①周立民:《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②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相比西方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无论是在产生的背景还是其实质内涵及表现方面,都更显繁复和驳杂。如果说西方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只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对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引起的人的异化问题的一种反思、批判与纠偏,那么,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除了同样有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担忧,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那就是要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说,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①,的确是这样。一方面,面对因西方武力与文化的侵袭而导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价值迷失与意义危机,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虽然有其必要性和伟大的价值意义,但毕竟客观上更加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危机心理和意识,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深刻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代表,他们更加确信,西方文化本身也存在致命的缺陷,面临深刻的危机,不值得“全盘学习”,反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可以拿来拯救陷入危机的西方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时,都是明确地把其和那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顽固守旧”区别开的,认为真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并不抗拒现代化进程,而只是对待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与主流的激进主义者不同。一方面,他们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留下来的文化要素”^②;另一方面“提倡融合中西文化,提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③所以,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应该以冯桂芬

①郑大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②[美]本杰明·史华慈:《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33页。

③[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5页。